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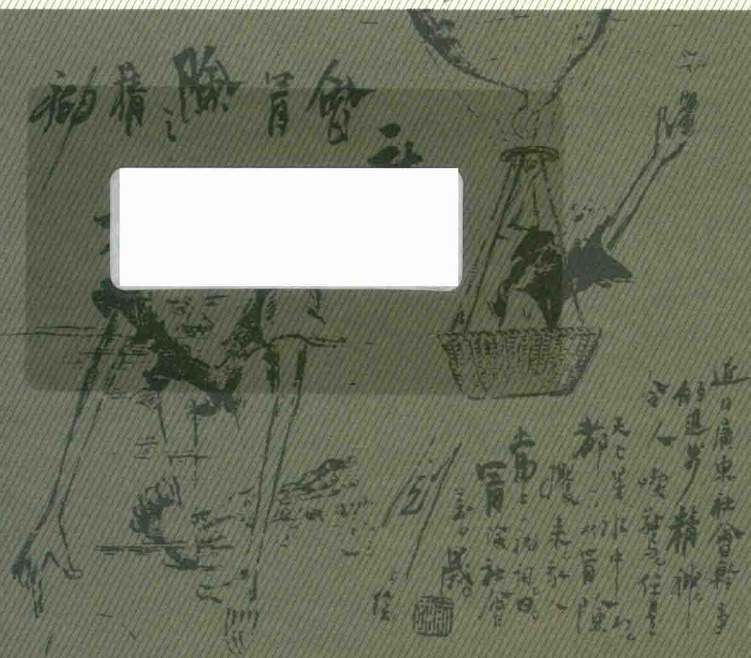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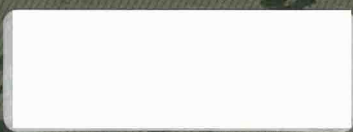


走出地方史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程美宝 著

會 冒 險 精 神



中華書局

走出地方史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程美宝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程美宝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6

(中大史学文丛)

ISBN 978-7-101-13874-0

I.走… II.程… III.文化史-中国-文集 IV.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1092号

-
- 书 名 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著 者 程美宝
丛 书 名 中大史学文丛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3½ 插页2 字数34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874-0
定 价 68.00元
-

《中大史学文丛》编辑说明

中山大学历史学科肇始于学校创立之日,近百年来,始终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在中山大学筹设。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由此兼承两校史学之学脉。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朱希祖、刘节、朱谦之、陈序经、罗香林、容肇祖、端木正、戴裔煊、梁钊韬、朱杰勤、金应熙、陈锡祺、蒋湘泽、何肇发等多位大师、名家,先后在历史系任教,为历史系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和优秀的传统。他们的学术事业,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们创设并发展的诸多学术领域,至今仍为历史系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园地。其教泽绵长,历史系历代学人均受沾溉,濡染浸润,以研求学问为职志,以守护学风为己任。

近数十年来,历史系同仁奋发有为,在继承前辈学术传统基础上,依托新时期不断改善的治学条件,把握当代史学发展趋势,在学术道路上艰辛求索,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与敦煌学、宋史、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历史人类学、东南亚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学术领域,勤奋治学,作育英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系学者的研究既体现了深耕细作、发幽阐微的朴实学风,也突出了跨学科交叉的特色,以及对学术理念和方法执着追求的精神。近年,历史系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均曾被评为国家重

点学科，世界史学科亦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显示了历史系学术实力整体上的提升。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历史系教师出版、发表了众多学术成果。编辑出版这套《中大史学文丛》的目的，是将各位学者所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按照各自的主题编辑成册，以集中展现他们多年治学的成就，供学界同行参考、指正。此次出版的是这套《文丛》的第一批，仅为历史系部分在职教师的研究成果。收入其中的论文均发表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在中国史学迅速发展并与国际史学界频繁交流的背景下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将这些成果结集出版，既可使各位学者得以借此机会对自己多年来的研究进行总结，也可以使我们回顾这一时期历史系学术发展的历程，以更好地筹划未来之大计。由于各位教师治学领域各异，故《文丛》并无统一的主题，但这样也许更能体现历史系作为一个学术集体的风貌。我们希望今后能继续编辑，以将其他同仁的学术作品渐次结集出版，持续地推进历史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

《中大史学文丛》自 2015 年开始筹划。这一计划提出后，得到各位作者的积极回应。中华书局对我们这一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和支持，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欧阳红女士进行了悉心策划和组织编辑的工作，各位责任编辑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大史学文丛》编委会

2016 年 6 月

前 言

本文集收入了我 1998 年至 2016 年间在不同期刊和论文集发表的学术论文多篇。编辑期间,除了改正明显的内容错误,错字、漏字和赘字外,我尽量保持各文原貌。有几篇题材类近的文章,因在不同时候发表,内容难免有少部分重叠;重叠较多者,则干脆合并;有一两篇文章之前因学刊篇幅有限或其他原因未能完整面世,在本文集全文收录。少数文章因时移世易而不得不删减部分内容或修改个别用字,自有已出版的旧文可作对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回原文一读。这些情况,都会在涉及的文章末处加以说明。

我把这批在不同时候发表的论文,归入四个主题重新组合。在这四个主题中,最切合“走出地方史”这个大题目的,无疑是第一个——“‘地域文化’研究再思”,这也是从我在 2006 年出版的专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一书出发的思考。在这个主题下收录的六篇文章,只有《“岭学”正统性之分歧:从孙璞论阮元说起》和《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两文的部分内容在拙著里出现过,其他都是在不同情况下撰写的。在这组文章中,我无意中把讨论梁启超《新史学》一文编作首篇,再把后来发表的《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置于其后,似乎要故意造成某种对比。其实,两篇都可说是“命题作文”的作业。前一篇是为了参加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的会议而撰的,我当时刻意以“地方史、地方

性、地方性知识”为题，重新思考任公“新史学”的意义；后一篇是《学术研究》的编辑十多年前在“全球史”这个概念在中国方兴未艾时跟我约的笔谈，篇幅不长，我当时希望这样的讨论能落实到中国史学上去，所以将文章定名为《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也许，正是因为多年来我在“地方”、“中国”和“全球”的视野间进进出出，才让我这个以“地域文化”命名自己首部专著的人，可避免别人误会我做的是“地方史”。纳入这个主题的，还有三篇长篇书评，分别评述杨念群、麦哲维、萧凤霞三位作者看起来都带有“地域性”色彩的著作。我之所以着力写出这三篇书评，不仅仅因为我认为这三部著作都值得大力推荐，更是由于我感到这三位作者尽管都聚焦于某地，但其实都提出了一些足以让我们走出地方史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赋予我们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评述他们的大作，实则借题发挥，略抒浅见。

第二部分也是《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书十分核心的议题——民族身份——的扩大或延续。我之所以自信自己不是在“做地方史”或“研究地方史”，是因为我在讨论 20 世纪的地域文化观的形成的同时，也注意到人们的国家观念在 19、20 世纪之交如何形塑。《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一文，大部分内容已收入拙著，讨论的是在现代民俗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尚未确立之前，“种族”和“人类”等概念如何在晚清政府用以鼓动爱国思想的乡土教材中出现，且引起争端。《从民俗到民族：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与民俗学兴趣》和两篇有关罗香林的文章，则通过个人、群体、机构等几个层面，述说 20 世纪上半叶民俗学和民族学在中国逐渐确立后，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族群的划分和想象。其中，《从民俗到民族》一文，一开始叙述了徐思道先生个人的经历，这部分并没有包括在拙著有关章节中，尽管徐先生是该章注释里的其中一个作者。如今重看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 2001 年我在当时还位于广州市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地方文献部看书时的一幕——正当我在埋首翻书时，一位身穿西装、个子瘦小却眼光炯炯有神的老先生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中山大学的人，我说是，他便说：“我也是中山大学的，顾颉刚是我的老师。”我连忙站起来问他姓甚名谁，他用清脆的粤语念出自己的名字：“徐思道”。徐思道！我怎会想到我博士论文中提到的一个 20 世纪 20 年代的年青人，会在 21 世纪忽然在我眼前出现呢！至今想起来，真感到这种历史相遇是一种福分。在讨论有关民族的问题的时候，我那篇有关台湾苗栗县泰雅人的命名与墓葬的打游击式习作，俨如一面镜子，照着我这个“汉人”，让我在一个相对疏离的族群情景中，从新思考“汉化”这个命题。采取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出出入入的思考方式，也是希望有助自己打破诸如“国家”vs“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僵化的族群分类概念。这些想法当然也受到当代人类学较前沿的视角的影响，心中也以之与 60 年前罗香林等史家或民族学者的假设加以对照，从而看出学术潮流和话语的嬗变。

在牛津念书和后来重访英国期间，因利乘便，我曾翻阅过英国公共档案处（后改称国家档案馆）有关庚子赔款的档案、藏于牛津大学 Rhodes House 的香港总督金文泰的档案，以及牛津大学注册处有关陈寅恪的人事档案，无心插柳地先后写成了《庚子赔款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和两篇论述陈寅恪计划就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三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大英帝国情景中的中国文史研究和教育，以及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关系，这是当初写《庚子赔款》一文没有预想到的。我们都知道，档案是政府和机构经筛选后分门别类入藏的结果。用档案写论文，即使辅以其他材料，还是很容易沿着某些既有的逻辑叙事。在这个时候，翻阅一下同时代的“八卦杂志”，也许对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态会有更实在的体验。我近年发表的《省港声色味：从 20 世纪 20 年代几种画报所见》一文，讨论的时代与《庚子赔款》一文差不多，一开始也提到金文泰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

深在省港大罢工后互相拜会以修补两地政府的关系，但接下来的内容都属风花雪月之事。我近年的部分研究，不觉逐渐以“省港”这个本来本地人都十分熟悉但随着时代洗礼而渐趋陌生的表述为主题，已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和草就了一些文章，更深入的讨论则有待充实。这里仅选用一篇，与另外三篇主题较严肃的文章并置于“香港在中英之间”这个题目下，颇觉相映成趣。

最后一个主题——“从虚拟空间回到实物”，是我对媒体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趣的反映。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正值互联网开始普及，随后几年，陆续目睹史料数据化和人们使用互联网制造大量信息（史料）势不可挡的趋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于传播系后来半途出家皈依史门的历史学徒，对此不觉有许多思考。21世纪头几年，我曾就数字时代的历史学这个主题做过多次讲座，写过一些文章，也把有关内容加进我在中山大学开设的本科生课程“传媒社会史”中，但真正系统成文的，是这两篇以数码时代电子族谱编纂为题的文章，至于其他侃侃而谈的，暂时只能藏于抽屉（电脑硬盘）中，未敢示人。有趣的是，即使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那么“新”的话题，但有些名词已成历史（如当年我因“万维网”发音接近英语 world wide web 而用之，但该词已逐渐被“互联网”淘汰），而当年访问过的网站，部分已在互联网世界上消失了。最后两篇文章，是我近年因缘际会把部分心思放到研究实物、物质和感官等课题的初步成果。它们是这部论文集的结束，但应该也是我未来几年的研究方向的起点。

于我来说，这批论文都是我正式以史学为业以来的“功课”。最初选编的时候，不免战战兢兢，恐怕今日之我，已无法直视昨日之我。其后在编辑期间，把文章从新审阅一遍，感觉尚算顺眼，乃敢示人。但这到底这是意味着自己多年无甚进步，还是证明自己不忘初心，在某些问题上仍能贯彻始终？实在难以自我评价。翻开主要考虑时序而编作第一篇的《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一文，未几映入眼帘的便是任公

“史家多于鲫鱼”的判语,我感觉自己就是芸芸鲫鱼之一,但愿不要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把这批文章汇合成集,也由此并无沾沾自喜之感,不过就是扎起来成一个作业本,方便读者打分而已。

这部文集之所以能够面世,必须感谢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在任历史系主任期间启动了相关项目,支持系里的同事出版个人论文集,也感谢江滢河教授为此项目对我们多番敦促。还有我以前的硕士生谢欣同学,担任我的研究助理,负责将全部文章作初步的编辑整理。写作这批文章的二十多年间,是我由牛津大学博士生成长为中山大学教授的二十年,也是我在学术上较有得着、颇为惬意的一段时光。这部论文集无论能否让我“走出地方史”,无论能否展示新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于我个人来说,都是标志人生某个阶段的一个分号,是值得铭记的。

初稿成于 2018 年 5 月 27 日,时旅居巴黎 Rue de Fondary 77 号

修订于 2019 年 4 月 5 日,中山大学蒲园蜗居

目 录

前 言

“地域文化”研究再思	1
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 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	2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19
“岭学”正统性之分歧： 从孙璞论阮元说起	25
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 评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38
超越地方史的华南研究： 评麦哲维《学海：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65
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 读萧凤霞《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	84
民族、国族与身份认同	103
从民俗到民族：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与民俗学兴趣	104

由爱乡而爱国：	
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128
台湾苗栗县泰雅人的命名与墓葬：	
一个历史学者的田野观察与省思	160
罗香林与客家研究	191
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215
香港在中英之间	241
庚子赔款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与中英关系的一个侧面	242
省港声色味：	
从20世纪20年代两地画报所见	266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293
“虚席以待”背后：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	317
从虚拟空间回到实物	333
数字时代的历史事实建构：	
以电子族谱编撰为例	334
网上织网：	
当代亲属关系的建构	346
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364
复制知识：	
晚清《国粹学报》的博物图画	370

“地域文化”研究再思

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

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

群体之历史：谁的历史？

这次会议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出发点，鼓动与会者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在史学门槛上尚未站稳的学徒，在不断练习这门技艺的过程中，我不一定有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只是经常会碰到“我自己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的疑惑。虽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不时会出现一些先行者，为我们释疑解惑，但新的疑惑总会不断地从已有的成论中产生。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 20 世纪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正如是次会议组织者所言，中国 20 世纪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文中找到端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再次阅读《新史学》一文，看看有什么牙慧可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弊病之一的这段话：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

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①。

梁启超这番史学主张背后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王汎森已经有相当细致的论述^②。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的责备，久为大家熟悉，到今天已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史学观点。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具有“新史学”意识的史学家、以中国为实验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革命家如毛泽东者，都曾经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史学界特别关注被标签为“起义”或“反抗”的历史事件，并以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为主线，去写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这类历史叙述虽然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但在某些课题（如三元里、义和团）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调查中，毕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其背后政治议程如何，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进入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潮流，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促使了有关“民间文化”和“边缘群体”（如乞丐、流氓）的研究大量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大声疾呼，在整整一个世纪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3页。

② 王汎森：《引论：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篇。

里,已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的积极回应和实践。

在几乎毫不犹疑地认同这种史观的前提下,我读着梁启超“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句话,马上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群体的历史”,往往会陷入“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的陷阱。我这里说的“个人”,当然是在偷换概念,梁所讲的“个人”是“帝王将相”,我关心的“个人”,是组成所谓“群体”的一个个人。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个整全的、社会学的眼界,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搅和成无名无姓的群体甚至一堆堆电脑数据。

在西方史学界,将普通人活生生的历史与其身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近几十年来最经典的著述莫过于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①,我们在惊叹作者处理大众文化和平民心态史的功力之深之余,也许无不为他“碰到”这批史料的运气感到妒忌。作者在该书英文版的序言劈头第一句便说他这个研究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由于机缘巧合(“As frequently happens, this research, too, came about by chance.”)。这类“机会”的难得,当然是所有史家深有体会的。罗志田和英国Leeds University的沈爱悌(Henrietta Harrison)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山西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力图揭示一个内地乡绅在大时代中的心态和行为,也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史料)至今仍是可遇不可求^②。

① 《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意大利文版1976年;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80年。

② 罗志田文章的题目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Henrietta Harrison的文章题目是“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 *Past and Present*, No. 166, February 2000, pp. 181-204.

我们知道,近数十年,历史学家这种研究取向,受人类学家的启发甚大,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其《中世纪的时间、工作与与文化》(*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中,最后以“走向历史人类学”为题,另辟一章,讨论“史家与普通人”,宣扬的就是历史学与民族学(英文译本用的是“ethnology”一词)如何在新史学的潮流中“重修旧好”^①。

可是,无论我们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家最致命之处,在于我们的“东西”必须是文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历史文献还是以文字记录为主。换句话说,我们从文献中探索到的,不过是读书人或至少是识字的人的观感,这些史料距离我们所谓“下层”的历史仍然相隔甚远。囿于我们读书人的优越感和偏见,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往往被遗忘掉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遥不可及的“他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人类学家给我们的提示可谓又爱又妒,我们既感谢他们不住地提醒我们要重视普通人的观感,又恨自己不能像他们一样,可以较直接地和自己的研究对象沟通。到底我们历史学家在这个研究平民大众的历史、理解普通人的心态和感情的战场上,是否应该宣布投降呢?抑或我们能够改善策略,让自己输得没有那么惨烈呢?

地方性知识 全球化威胁

其实,在人文社会学者理解他者的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兜了许多圈子,走了许多歪路,取得的教训也最深刻。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美人类学家,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年代里,走进部落社会,尝试在“原始”民族中找寻人类文明的起源,这样的出发点,使他们忽略了可以用同样的距离和眼光,去观照自己身边的人和社会,甚至观照自己。二次大战前

^① Jacques Le Goff, “The Historian and the Ordinary Man”, *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